

文革博物馆专集（九）

当年的老红卫兵以“革命后代”自居，在学校率先造校长、老师的反，继而冲

向社会造“牛鬼蛇神”的反，制造“红色恐怖”。他们当中为首的是一些高级干部子女，然而文革开始后不足半年，运动的火烧到自家老子头上，他们就成了“保守派”。那些组成“联动”（北京市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攻击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老红卫兵，更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尽管是“红色恐怖”的主要肇事者，但在文革结束后很少受到追究。这是因为当年他们多为未成年的中学生，也因为他们有高干的家庭背景。今天，这种身份仍然是他们在社会竞争中的重要资源。

谭力夫可算是老红卫兵的风云人物，高级干部子弟。六六年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赞赏“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从而名噪全国。不久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批判，关进监狱，更名为谭斌。文革结束以后，他曾在邓小平儿子邓朴方麾下的康华公司任职，在武装警察部队任军官，现在是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兼党委书记。

文革初期，北京市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西纠”）曾经威风一时，它的头头多为高级干部子女。文革后，在中共元老陈云的直接干预下，西纠和联动案得到平反。它们的一些头头或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子女，或与高层领导子女有密切关系，同时自身又具备一定能力，纷纷成为“第三梯队”（接班人）成员，得到重用。著名的光大、中信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就有原西纠的头头。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中，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现为解放军将军，已故原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现出任驻芬兰大使。

但并非所有高干子弟都是“保守派”红卫兵。叶剑英元帅的养女、前北京《光明日报》女记者戴晴当年就是个“造反派”。她表示，当年“造反派”确有不少失误，而“造反派”在文革后一度成为“坏人”的代名词，但她本人不认为当过造反派有什么可耻。她认为：“许多曾被造反派打倒的中共元老在文革后控诉如何被迫害，但这些老干部其实也有一定责任，正是他们协助毛泽东巩固权力，老干部可说在文革期间自食其果。”

不过，造反派的领袖大多不是高干子弟，而来自群众以及一般干部家庭，他们在文革中主要冲击当权的党政领导。为此，在文革后，他们中很多人被列入“三种人”（打砸抢、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不得重用，有些人受到法律追究。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可以算作代表。

蒯大富是以攻击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名的清华大学学生，“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六六年至六八年他叱咤风云两年多，六八年工人宣传队进校以后开始受到批判，后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作技术员。七零年他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七八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八三年判处十七年徒刑，刑期自七零年算起。他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八七年刑满释放。

蒯大富出狱后才结婚成家，九二年应聘到山东蓬莱市的乡镇企业任工程师。九三年春，他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企业，至今不敢以本名示人。文革和红卫兵经历，一直是蒯大富反复思考的事情。他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且为之悔过，但是不能接受判决书指控他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

蒯大富走到哪里都有不少朋友，其中既有清华大学旧“战友”，也有文革时的对立派别的一类。不少文革的过来人对他的过去持批评态度，同时又表示理解，因

为那是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的失误和迷失。而蒯大富为此已经承受了至少十七年的监禁，一些人认为，论惩罚也足够了，他有权利开辟新的人生道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韩爱晶二十岁，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头头、首都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六八年工宣队进校后他被羁押，后分配到湖南株州一家工厂作技术员。七一年受隔离审查，接着被监督劳动，七八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八三年被判十五年徒刑，八六年获释。先在劳改农场，后回到原工作单位工作。

九〇年韩爱晶对一个朋友说，他为自己参与打击、甚至动手殴打解放军元帅彭德怀感到深深的悔恨。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聂元梓被当做红卫兵领袖原本有些滑稽。她是抗日时期参加共产党的干部，六六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四十五岁已是作红卫兵妈妈的年龄。她因为领衔签署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举成名。六八年工宣队进校后她受到批判，但六九年中共“九大”上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一年又受隔离审查，七八年被逮捕。八三年她被判十七年徒刑。据说她于八四年获假释，以后化名王兰，“下海”经商。她运用与一些领导干部的老关系为生意打开了局面。她致富之余，资助家乡建设，赢得了一些赞誉。当然，她不会忘记文革，并说她有意撰写回忆录。

当年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要负责人王大宾先被关押，七八年正式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八三年释放，回四川省地质局成都修配厂工作，近年也“下海”经商。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公社”主要负责人，关押期间于八二年患癌病死于狱中。死后一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对她的审判结论是：认罪态度较好，犯罪情节较轻，免于起诉。

李冬民的情况与上述几位有所不同。他在文革之初是北京二十五中高中生，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六八年参军，七零年被审查，后来复员到北京一家工厂作工人。七六年参加清明节悼念周恩来逝世、抨击“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七七年清明节前夕，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阴谋策划反革命活动罪而逮捕，次年无罪释放。

获释后李冬民先经考试在北京市社会科学所工作，后来自己创建了民办的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一九八九年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被民众推翻后，他上书中央，称罗马尼亚以及东欧的政治剧变是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件，而不是罗马尼亚和东欧的选择，并批评中共中央的政策“右倾”。但这种左的反对意见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麻烦。

∞ ∞ ∞ ∞ ∞ ∞ ∞ ∞ ∞ ∞

文革“红人”今安在？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在文革中几乎同时被毛泽东抛弃。他们坐牢多年后，现都已返回社会，反省并评说文革，但对毛泽东仍心怀敬畏。

广州的《南方周末》三月十五日发表杂文家何满子的文章《“文革悍将”的复出》，并配有一幅颇为触目惊心的漫画：棺材打开，“文革悍将”坐了起来，神气活现地向人们招手。何文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专指大名鼎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具体指的是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劳动报》发表叶永烈写的《从历史中

走出——王力在上海》。

何的文章认为，王力再次亮相，时机选择在文革三十周年的前夕，是要表示“你们不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吗？我这悍将照样招摇过市，让大家看看”。

他对王力的抨击也够猛烈的，“被宽大赦免了的人，也该知道点天高地厚，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才是。但他认为，王力却是个“极不本分、不甘寂寞的人”，老是“探头探脑地窥测时机，以图一逞”。

九五年秋冬，王力去了江苏、山东、四川、上海等省市探亲兼做考察，确有不寂寞的劲头。高高瘦瘦的老人来到上海时，身穿黑西装，戴一顶带有白帽圈的黑色礼帽，这是他一九五六年出访南美洲时的“出国装”。当他脱下礼帽，便露出光亮的秃顶和一圈雪白的细发。

王力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江苏淮安。他已经整整四十二年没有来上海了——当然不包括他当年作中央大员匆匆路过上海，下榻锦江饭店。王力曾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副主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文革中，王力赫赫有名，尤其是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事件”曾遭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绑架和殴打，回到北京被当作英雄欢迎。但四十天后，王力在中南海钓鱼台一次会议上与另一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一起遭批判。先被软禁在钓鱼台，后关押在西山，六八年一月由秦城监狱收监。王力、关锋以及稍后被“揪”出来的戚本禹一起成为“反党乱军”的代表人物，合称“王、关、戚”。

#### ◇ 王力拥毛拥邓又拥江

王力命运的奇特之处是，专案组人员从不审讯王力。因为他长期在中央部门起草文件，对核心的重大决策了解太多，越交代麻烦越多，不如让他闭嘴。八〇年“四人帮”受审时，他也没有被押上法庭。八二年一月王力获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免于起诉书，八四年二月他被开除党籍。

八九年初，香港《大公报》和上海《联合时报》（原文如此——编注）同时推出上海作家叶永烈采写、经王力改定的长篇专访《王力病中答客问》，文中提及了邓小平对王力的一段评价。这是王力自六七年八月倒台后首次接受采访，也是他经过二十一年沉默后的首次公开亮相。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许多文革受害者的愤慨。其实，王力还写过文革长篇回忆文章。他还准备写作《王力回忆邓小平》。

王力的谈话依然不离政治。他最近用三句话概括他当今的政治观点：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邓小平这面旗帜不能倒；对“江泽民核心”要拥护，要保护。一年前，王力应一些文献研究部门之邀，谈了对毛泽东的认识。他说：“对毛泽东，神化不对，鬼化更不对；美化不对，丑化更不对。至于造谣诬蔑，那是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允许的违法行为。”

他说：“主席晚年的错误是从主观的好心出发，走向迷误，越陷越深，一直不回头。他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依靠小将，不行；依靠老将，不放心。依靠军队，又不行；依靠工人，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不行。走马灯，恶性循环，他自己也收不了场。”

王力谈起毛泽东，也就提及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他不仅看过这本书，家里也有这本书。王力认为，这本书许多地方不符合事实。他说，他写《王力回忆毛泽东》就是要纠正这本书中一些错误。王力还准备写中苏论战回忆录。

因为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王力是挑大梁的角色。在中共中央批判苏共的著名“九评”中，王力参与写作了其中的八篇。他本人也“十下莫斯科”，参与与苏共的谈判。

不少人认为王力的回忆录值得一读。王力毕竟自五九年以来一直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六〇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进入钓鱼台写作班子，知道许多高层内情。对许多历史问题，他能说出别人不太清楚的背景。不过，他写惯了政论，再加上别人酷评，下笔异常小心谨慎，所以他的回忆录显得过分拘谨以至干涩。他承认自己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为自己辩护。

王力曾这样评论文革：“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反文化、反科学、反民主、具有极大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这个历史是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应重演了。”

#### ◇ 关锋潜心古籍研究

文革三十周年之际，人们对当年风云人物近况都怀有强烈兴趣。对协助毛泽东推展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称之为“大三”，而把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称为“小三”。

出狱重返社会的关锋，不象王力那般在社会上活跃。关锋不接触记者，不谈现实问题，更不谈文革，潜心于先秦老子思想和甲骨文字学、古音韵学的研究。九一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与夫人周瑛合作的《老子通》，这部八十万字著作获吉林省首届优秀图书一等奖和长白山学术基金会一等奖。他近年撰写或合作的还有《惠施及先秦名学》、《老子十日谈》、《论语十日谈》、《论语今译和解说》。关发表的学术论著一般都用“古棣”（一个县的地名）笔名，他与人合作的学术论文递交给国内外的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也总是他的合作者，因为他不愿抛头露面。

今年六十五岁的戚本禹，三十六岁开始坐牢。八三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宣判时，戚已关押了十六年，出狱后到上海图书馆工作，如今已退休。他与人合作的《大人物的变态心理》由吉林省时代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一阵风波。因书的封面印着作者戚文（另有一合作者），而书里的版权页上作者却是戚本禹。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独到见解，曾与人主编了二百余万字九大卷《中华易学大辞典》，并研究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也为真禅法师等人的著书作序。

#### ◇ 戚本禹恩怨分明

戚本禹对《亚洲周刊》说，一个民族没有伟人是可悲的，一个民族有了伟人而不崇敬伟人同样是可悲的。他至今依然认准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伟人。

他说，“毛泽东是我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的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坐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是在最后关头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跟他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

他也读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虽然书中多处为戚本禹辩护，但是戚本禹以自己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亲历，驳斥李在书中“随意编造谎言”。

戚本禹出狱后深居简出，回避记者，少谈政事，也不写回忆录。退休后他钻研

学问，也讲学，近年甚至涉足商海，对金融和银行特别有兴趣。他说，能办一个民办银行是他的心愿。

关锋和戚本禹虽然长年坐监，但身体还不错。而七十五岁的王力，九年前曾被确诊患贲门癌，后来又发现癌扩散，但病情受到了控制。他的家人告诉《亚洲周刊》，今年五月八日王力在北京动胰腺手术，他的胃、鼻、嘴都插满了管子，“情况不大好了”。

□ 以上二文原载《亚洲周刊》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分别由周其弘、王祝丰输入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王蒙、陈建功、李辉对谈红卫兵

王：最近读了李辉的《残缺的窗栏板》（《收获》1995年第一期），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一代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以及如何更正确、更理性地反省红卫兵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的不足恃，从而更好地认识和评价现实。这个题目非常大，非常重要。

李：题目大文章就不好作，但问题还是应当提出来。这不仅涉及到历史反思，也是关于如何看待文化和精神状态，如何走出历史误区的问题。当然，把这个问题说完整、全面、符合历史事实并不容易。

王：我觉得不仅红卫兵这一代有这样一个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甚至人的一生始终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关联与掌握问题。完全没有理想是可悲的，但要执着于某种先天就带有缺陷，至少是比较幼稚的理想，然后变得偏执，甚至把理想变成一种自我欣赏、一种自恋、一种膨胀以至疯狂，那就会产生很可怕的后果。一位西方哲学家说通向地狱的道路，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

李：这牵涉到对理想怎么看。过去我们习惯的做法是确定一个唯一的、涵盖一切的理想，说它是好的、每个人都必须有的，在这样的定式下，要求每个人按同一标准来接受理想。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个人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生存环境、性格兴趣、知识结构、对自己的要求都不一样，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理想也是多种多样不同层次的，它可以是政治理想，可以是道德理想，也可以是价值判断上的理想。一个中学生的理想可能就是想当一个飞行员、宇航员，它与人们所说的终极关怀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与此相类似的理想的存在，我认为都是非常合理的。

陈：这话题使我想起最近举办的一次“老三届”晚会。从电视上看完这台节目令人叹息。其实我也接到了邀请，因为怕上电视，所以我没去。铁生去了，因为拗不过老同学的盛情。事后我问他的感觉，他说惨就惨在会场上没有什么反应——这与我看电视的感觉相同。这场面使我觉得很有一点象征意味，反复吟唱“青春无悔”之类究竟还能在这个时代激起多少涟漪？我很难过，难道我们的生活哲学都贫困到如此地步了吗？连语言也显得那么苍白空泛，没有生气。

李：这恰恰是那个时代造成的。热衷于历史留恋的人和生活中的人脱节了，精神难以产生共鸣。

陈：但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们都没有进步吗？怀旧当然可以，但应有新的哲学高度对那段历史加以审度，对那时的思想加以反省，对现实生活加以观照

李：我也有同感，会上没有一句话对那个年代进行反省。有意思的是请了一位特级教师、中学的校长上场，代表教师向老三届的同学表示敬意。真是奇怪，历史告诉我们恰恰是老三届中的红卫兵学生对教师冲击最大。

王：每一代人都是很珍惜自己青春的。即使青春是在胡同串子的生活中度过的，他长大以后回忆起来仍然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感情。这与对某一时期社会历史的评价不一定要纠缠在一起。对一个人来说青春只有一次，不论赶上什么年月也是珍贵的。王朔的《动物凶猛》（拍成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写一群中学生百无聊赖，打群架，拍婆子，到老莫“撮”。那是文革后期，干部去了干校，老三届的上山下乡，也没有什么大事了，社会秩序也乱了。他们对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是怀念的。你们说到老三届，使我想到我很快要参加一个活动，我们年年有，就是五十年代我们一起工作过的团干部聚会。这些人也都经历过种种坎坷，埋头苦干，很少有飞黄腾达的，而且不少人已进入退休年龄。我们聚会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调子——想我们当年多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思想好，批评自我批评好，什么都好。也看不到当年我们很纯很正的理想主义中的起码是简单幼稚的成分。作为对自己青年时代的珍惜，这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但要作为社会历史的评价，如建功所说这就是哲学的贫困了。我们不能把当初的那点理想当成一把剪刀来裁剪现实，更不能用它来裁剪旁人。人人都得符合我十八岁甚至十六岁时树立的理想，不符合就痛恨或是声讨，这是不可以的。现实是不断发展的，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变化太大了。人的理想也是不断变化的，有一部分理想已经实现，比如国家独立了，大陆统一了，工业基础也建立起来了；有一部分理想在实现的过程中它变了样了，比如社会治安问题比五十年代更复杂也更艰巨了；还有一部分理想压根儿就不切实际，比如要求人人都掌握客观规律，做的每件事都符合客观规律，这谁能做得到呢？所以我觉得理想本身就应当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且需要有新的东西不断丰富补充，要用实践和生活不断充实我们的理想，充实我们的哲学。

青春无悔我觉得也对，很简单，因为悔也无用。知识青年说我们上山下乡是有收获的；我没上山下乡，而是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高潮，中断了学习，出来做团的工作，更无悔了，我们革命，我们比谁都光荣；五十年代一些年轻人被选送到苏联去学习，他们也无悔；王朔他们也无悔也在胡同的生活中成长起来了，闯来闯去也看透了人生的许多东西。青春无悔并没有提供什么思想武器。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从对自己青春的珍惜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的现实似乎把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撞碎了。

李：你说的这些我同意，对个人来说青春无悔是可以的，但在青春无悔的言词下面掩盖对现在的年轻人或新事物的否定，这就很可怕。例如用过去的理想标准指责现在的年轻人无理想、无信仰、政治观念淡化、拜金主义等等。而被指责的有些东西可能恰恰是历史的进步或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的东西。

陈：刚才王蒙谈到每一代人都很怀念自己的青年时代，这是事实，但红卫兵这一代有点儿特殊。我是亲身经历过的，李辉文章的立论观点很好，但我觉得在提到红卫兵的时候太宽容了。我虽然没有打过人，也没有去破过四旧，但也是广义上的红卫兵。你对红卫兵的理想主义过于轻信了，很多人都轻信了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实际上它不象报纸上一些文章所说的那样，不象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所说的那样，那么纯真，那么狂热于一种理想、一种信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两年前我和一个老红卫兵的头头一块吃饭，她一边喝酒一边说：江山是我爸爸他们打下来的，凭什么让你们发财！我也他妈发财去。这观点绝对是红卫兵式的，果然她搞房地产、炒地皮，半年后发了大财。很不幸，发财以后得癌症死了。

王：我这里插一句，李辉文章里所说的红卫兵是红卫兵中的纯真、精英、最好的部分。红卫兵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社会，里面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流氓也有，小偷也有，贪便宜的也有，越怯懦孱弱越要表现自己的残酷无情、立场坚定的也有，崇拜狂、迫害狂也有，甚至杀人越货完全变成刑事犯罪的也有。

陈：即使象你所说的这样，好的那部分红卫兵和他们的理想主义也有很大的水分，这不光指他们理想主义的幼稚成分，对他们身上人性的弱点要有充分的估计。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起家的那部分红卫兵，一开始革命的口号比谁都响亮，因为他们知道“子承父业”的时代来了，当时最流行的文章是《触砮说赵太后》，最核心的思想是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一夜之间老子受到冲击，也被打倒了，于是他们之中大部分的革命热情一下子变为颓丧、消沉、拍婆子、下馆子、打架拔份儿，什么主义都没了。象我们这样的平民子弟，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也起来成立红卫兵，要革命要造反，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不少人同样是一种自我膨胀，要打江山坐江山。过去也认为江山是人家爹妈打下来的，自我感觉上就矮人一截，现在江青一折腾，支持造反派，机会来了，我们也要造反也要打江山坐江山。本质上是这么回事。不管是哪种情况，红卫兵运动演化出的精神成果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惊世骇俗，都可以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占有领袖地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横扫一切。不仅红卫兵，那个年代整个理论界莫不如此。这影响了八十年代以后的一代学风，刘晓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什么李泽厚，什么王蒙、从维熙，我全把你们扫了！他没有一点大家共同建设一个精神家园的宽容。我们可以各树己见，更可以互相欣赏，使不同的意见能互相启发，互相补充，这样才能建立一种开放时代中国文化的格局。不然就“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了，这根子还是文革，还是红卫兵式的思维，这也是我说不要轻信红卫兵理想主义的原因。

王：对红卫兵我是这样看，如果把它从历史中抽出来孤立地进行分析，我觉得也不公正。红卫兵的心态、红卫兵的模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中国近百年来剧烈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有关，一直在进行着流血的斗争啊。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哲学里头关于怎么斗争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有理有利有节、孤立分化瓦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再加上国际斗争，同日本斗、同美国斗、同苏修斗。恰恰是在残酷的斗争中，理想主义能够升华到一个非常崇高、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步。越伟大的理想主义越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你住着好房子，穿着好衣服，拿着高工资来说理想主义，你的这个理想主义的魅力就会相当差；如果你是苦行、禁欲、面临随时掉脑袋的危险来宣传你的理想，这是一个钉十字架的理想，这时候你显得非常伟大。

按道理一九四九年以后革命胜利了，人民掌握了政权，我们的斗争的哲学应逐步向建设的哲学发展，我不知这么说对不对。而我们却人为地延续了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最后发展成红卫兵。文革初期最早的红卫兵受到迫害，在虚假的光环照耀下，他们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充满了一种壮烈的激情。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激烈的年代，在外敌入侵或自然灾害的非常时期，这种壮烈牺牲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在和平建设时期，不断发展、补充、完善和变革这种精神。

陈：你对红卫兵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角度，我很感兴趣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红卫兵在国外引起的巨大反响。海外的激进人士也借红卫兵的外衣演出了许多热闹场面。台湾学人蒋勋到大陆后向我了解红卫兵运动，问大陆青年怎么能那么快、那么简单就把红卫兵运动否定了呢？当年我们在法国搞红卫兵，那是何等豪迈、激动的人生一幕啊！还有一位某国驻华的外交官，白种人，他告诉我，他在那年月也是他们国家的“红卫兵”，他甚至在台湾驻他们国家的“大使馆”门外挂了一条大横幅——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他的未婚妻是台湾人，由于他的行为，台湾当局不干



了，不准他们结婚入境。日本有个作家立松和平当初是早稻田大学闹学潮的领袖，现在是我朋友了。不管怎么评价红卫兵运动我觉得它太有意思了！我甚至有一个设想，让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中坚人物各自写出回忆录，联合出一套书，留给后人去琢磨。

几乎与红卫兵同时，美国的青年中也闹着嬉皮士运动。红卫兵运动是剃光头；嬉皮士运动是留长发；嬉皮士把自己身上弄得脏兮兮，给整洁的美国中产阶级、绅士淑女脸上抹黑，用恶心你的方式向虚伪挑战，红卫兵则是洗得发白的一色绿军装，纯洁统一，英姿飒爽，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要说抹黑是直接给牛鬼蛇神抹黑，并不把自己弄脏。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觉得这许多都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很好的题目。总之，在我们反省红卫兵运动时候，有许多文章可做，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王：这涉及到青年的问题，青年人很容易倾向于反体制，反既定的价值标准，渴望急风暴雨的降临，然后历史从他们开始。这有他们幼稚的一面，有时也可以变得很可爱，正如毛主席在他的诗词中所说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从中可以看到青年人的可爱。红卫兵运动则是把本来可以理解的青年人的批判精神、燃烧的热情甚至爆炸的姿态引向了巨大的破坏。

□ 原载《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六期：“精神家园何妨共建（之一）”

∞ ∞ ∞ ∞ ∞ ∞ ∞ ∞ ∞ ∞ ∞

文革为什么成为禁区？

• 齐全德 •

今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十周年。它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不仅仅在一个意义上是如此。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无论就其内涵之丰富、其震撼之广度与深度、其对于后来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之深远而言，文革都是破天荒第一个大事件。它既是一场大动乱，是一场大劫难、破坏，同时又是对于全社会原有秩序的大冲击。假定没有发生这场文化大革命，近十几年来中国一切积极的变化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倘若六十年代前半期的情况继续延长下去，中国也完全可能出现和北朝鲜相似的几十年死水一潭的局面，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等方面，都极其相似。两个民族连在共产党统治下遭到的灾难都很近似——中国是1959—1962年大饥荒，北朝鲜则是几十年绵绵不绝的半饥饿状态发展为去年以来的大饥荒，而两个民族对这种把自己推到生死存亡境界的残暴政权与制度，反应也是相同的——大多数人逆来顺受，极少数人的反抗无不立即遭到扑灭，如一闪而过的流星，在黑夜般沉寂的民心中竟留不下一点痕迹，以致无法成为有朝一日的火种。

是文化大革命，也只有文化大革命这种由最高权威发动因而既合法、又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运动，才能使人民群众中蓄积已久的、长期窒息下的对现行制度的不满有了一个渲泄的机会，并且由于毛泽东钦定而享有了一定政治自由而迸发为不可遏制的巨大动力，使中国人第一次成为革命变革中的重要角色。迟至八十年代中期，仍有人把几亿人狂热参与的文革解释为对毛泽东个人迷信造成的盲目追随，至少是很不深刻的。笔者在八十年代初期有幸在巴黎见到一位中国青年学者麦冈先生，他当时对文革动因的理解就已远远超过几年后问世的文革史的水平。

值得国人深思的是，对于中国为之付出极其惨重代价而写成的文革这部不逊于瑰宝的伟大教科书，我们竟连它的第一页也未曾读完。“伤痕文学”浅尝即止，作者们常因一个短篇便可跃居为文坛名流，从此乐不思蜀，远离中国人的命运了。中共在1981年批判白桦的影片《苦恋》期间，曾表示对于1957年反右运动和

文革的题材最好少写（见中共中央宣传部1981年第七号文件），并未把大门关死，而且仅指文学艺术作品，然而已足使许多人知难而退，另觅逃避现实的安全途径，以致对文革的认真反思和研究成为冷门。

成为讽刺的是，自是以来的十几年，邓小平集团在片面推行经济改革以加固中共统治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官僚集团大大膨胀，为其提供掠夺国有资产和盘剥人民的种种机会，使腐败泛滥成灾（所有这一切，正是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奋力打击的对象），同时又极力限制和打击人民群众参与改革过程的要求（这又正是文革的主要积极后果），终致引发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六四”以后邓小平疯狂地、不计代价与后果地追逐经济增长，只能使原有种种危机越发严重。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于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以及全社会的腐烂和人的非人化趋向难以容忍，数以千万计的人生存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产生了对文革的怀旧情绪和寻求改变现状的途径，是很自然的。

这时，我们在知识界见到的情况又和八十年代有所不同了。少数文学界“精英”把人们因不满现状而对文革中某些东西有所怀恋的情绪称之为“文革情结”、“文革思路”、“文革语境”等，加以否定；一方面和中共站到一起“彻底否定文革”，同时极力维护现状，说中国现实状况是“非战争状态下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见《读书》1995年7—9月号王蒙等三人对话录）。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对于一切对现状（包括对他们的错误）持批判态度的人，则称之为“红卫兵”。看一看这些人的背景，再想一想国内外另一些“精英”的作为（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全盘肯定甚至提供理论依据，号召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使命感和责任感，声称中国实现民主的条件远未成熟，等等，为这个政权充当谋士、辩护人和说客），就不难发现，一个为中共统治集团保驾护航的知识分子既得利益集团业已形成。

文革本来就不是一个纯历史题目，它的正面和负面的后果都活生生地在今日中国的现实中运作着。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共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清查“三种人”、邓小平提出（实际上是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和后来从新宪法中取消“四大自由”时起，中共领导便庇护文革中的罪人，打击文革中新生的健康力量；坚持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错误的东西，用来打击、扼杀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健康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东西——人们的独立精神、批判态度和投身社会变革过程的热望。

知识分子既得利益集团全盘否定文革和反对批判与改变现状的理由是：“左派”的势力还在，对现状的任何批评都会助长“左派”对改革的否定。的确，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左派”即保守势力反对改革、使中国退回到文革前状态的野心不死，是一个事实。但是这股势力无论在党内或社会上基础都已很薄弱。邓小平式改革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和危机，也确实为它提供了蛊惑人心的武器。其实中共“左派”是最没有资格对改革说三道四的，因为邓小平的失误，说到底，都是在“左派”压力下和邓力群等人伪造的情况诱引下发生的，而这又是由于邓小平同邓力群之流惧怕人民——反对政治改革以及以拥护中共统治为首要利益上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对于中国现时危机作出正确的分析而不是回避或放弃这项工作。

这又引到了另一个问题：邓小平和邓力群所代表的当年中共领导阶层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派，他们同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关系？几乎所有中共干部，都曾是被毛泽东打倒的对象，因而他们伤痛至深，视文革为一场恶梦。就领导层而言，少数人由此大澈大悟，如胡耀邦、罗瑞卿、周扬、胡绩伟等，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赵紫阳、陆定一、任仲夷等人。邓小平则属于更低层次。但所有这些都主张改革，彻底性不一而已。邓力群则本来与邓小平一致，但1979年后则转移到反对改革的一方。中共所有层次上的大分化，使中国的改革遇到的阻力大大小于苏联，乃是文革的主要的正面效果之一。不同派别对于改革的态度同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相一致。保守派所要否定的，正是文革十年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主要又是人民群众一度享有过的

有限的言论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从而能够反思中国历史和参与改变中国现实，包括对官僚集团及其特权和腐败的批判。

□ 原载《大路》月刊 第三卷 第四期 1996年4月15日出版

~~~~~

【历史资料】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

• 唐少杰 •

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典型、最有影响的群众造反组织。本文对该兵团的几个问题作一评述，仅供文革研究者参考。

### ◇ 一、兵团的由来

一九六六年六月，清华大学文革运动开始。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影响下，清华学生开始张贴大字报批评校党委。六月八日，中共北京市新市委派了五二八人的工作组进校。十三日，工作组宣布停止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的一切职务，由工作组代行领导职权，工作组成员接管学校各级组织。十二日至十六日，一〇三名清华干部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清华大多数干部被置于“上楼”检查、“下楼”过关的境地。工作组把一二人定为走资派，十六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五十多人当成牛鬼蛇神，清华处于混乱、瘫痪状态。工作组力图把清华文革运动纳入他们的领导轨道，但他们的所为受到一些师生的反感或抵触。六月十五日，工程化学系九〇二班蒯大富等十几人开会决定与工作组抗衡。十六日至廿五日，蒯大富等人多次贴大字报抨击工作组及其领导人。工作组从六月廿四日至七月十七日多次在全校范围内组织批判、斗争蒯大富。蒯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蒯先后以上告、绝食、出走等行动表示绝不妥协。六月十九日至八月三日，王光美先是以“蹲点”后是以组员参加了清华工作组的工作。七月中旬，毛泽东严厉批判刘少奇等人的工作组路线，清华园内的形势急转直下。七月廿二日，工作组尚未撤离，王力等接见蒯大富并表示支持。八月四日夜，北京市新市委在清华召开工作组问题现场会，周恩来讲，为蒯平反。自八月起，清华乃至全国的文革进入了以红卫兵造反运动为先鋒的阶段。

“红卫兵”起源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九日，该中学少数出身革命干部、工农家庭的学生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造反组织。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从此，红卫兵运动及其组织风靡中国、震动世界。红卫兵运动成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全社会性的造反运动。

清华大学本科生的红卫兵组织出现于工作组被正式撤销之后。八月八日，唐伟、汲鹏、陈育延等成立串联会，讨论工作组性质并批其资反路线。这些被称为“八八”派的人于八月廿二日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月九日，贺鹏飞、刘涛、刘菊芬（分别为贺龙、刘少奇、刘宁一的子女——编注）等成立串联会，只批黑帮而回避工作组问题。这些被称为“八九”派的人于八月十九日组成“清华大学红卫兵”。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一些红卫兵组织相继出现。九月廿四日，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告成立。当时仅有十几人的井冈山红卫兵发表了一系列声明，提出了三大口号：批判工作组的资反路线，批判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被工作组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师生在当时的称呼）平反。实际上，一九六六年七月底至十一月，清华大学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时由“清华大学红卫兵

临时总部”、“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主席团”先后掌握学校形势。这些被称为“三临”的清华红卫兵领导机构并未得到广大学生的一致承认和拥护。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及中共中央内部情况，以高干子女为主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其领导人于九月廿九日宣布自我罢官，一部份成员转而成立了造反兵团支持蒯大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分化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相比之下，井冈山红卫兵不断壮大，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最重要的是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青睐和提携，蒯大富在九月出任“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三司）”司令就是证明。十二月十九日，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两个总部宣布合并，召开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大会。由此，井冈山兵团崛起，成为在清华大学独占鳌头并在北京乃至中国独领风骚的红卫兵组织。

## ◇ 二、兵团的崛起

成立伊始，兵团进行了两方面的斗争。一是加紧“围剿”清华大学红卫兵。该红卫兵中有人在十一、十二月贴出反对中央文革、痛斥江青、怀疑林彪，批评文革运动的大字报和标语。兵团大举反击，终于使该组织崩溃瓦解。二是响应中央文革的意图，把批判刘少奇的斗争推向新阶段。十二月十八日，兵团成立的前一天，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约见蒯大富，并对斗刘问题作了交代。张春桥绝不会以个人身份来交代此事，他的身后肯定有更大的指使。十二月廿五日，清华大学五千多名红卫兵和教职员工分五路进城，上午十点在天安门广场会合，然后又分五路，在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进行“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他们沿路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呼喊口号、召集短会，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势广泛地引向社会。这一被兵团称为“重大战役”的活动整整进行了一天。与之相应，兵团于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在其发行全国的《井冈山》报上，以专刊形式发表了刘少奇之女刘涛的长篇检查，从家庭内部来揭露刘少奇、王光美镇压文革、斗争蒯氏的“罪过”；并于一九六七年的第一天在同一报刊上发表“炮打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有关文章，列举刘在中共历史上的十二大“罪状”。一月六日晚，兵团一些人以刘少奇、王光美之女遭车祸之名，把刘、王骗至医院，然后“智擒”王光美到清华园，连夜举行全校批斗大会。在斗刘问题上，兵团心领神会地充份发挥了中央文革的意图，以自己的群众“战役”完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战胜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一个回合，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反刘、邓路线的突击队。

兵团因自己的“战果”而身价倍增，并近于如痴如狂。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夺权，就是捍卫党的领导，就是捍卫无产阶级。夺权，是无产阶级派的当务之急。此时不夺，更待何时！”“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权权权，是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对！我们就是满脑子权权权，就是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当糊涂虫、马大哈。”自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不久，兵团更加执著于在清华园外抢权、夺权。兵团的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主义倾向益发难以收拾。自一九六七年初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兵团内就不断出现咒骂周恩来、怀疑康生、批评中央文革、否定陈伯达、斥责江青、抨击谢富治，甚至对毛泽东、林彪本人也有所“不敬”的事例。兵团内的许多人实际上以知识分子狂热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情绪置身于文革的洪流中。另一方面，兵团在许多场合格外炫耀他们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特殊关系。根据形势的需要，竭尽所能地吹捧江青等人，宣传自己与中央文革之间的亲情，以中央文革的嫡系而自居。这往往带有政治上的虚伪和投机成份。一个花絮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蒯大富风闻聂元梓请陈伯达当北大校长，于是他写信给周恩来，请求周恩来当清华校长，周恩来五月六日回信辞绝。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兵团有关头目认为，关于文革的本质应从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去理解。如果只是看到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那是永远不能理解文革的。因为党群矛盾、干群矛盾比起一小撮走资派的矛盾更加深刻地反映了文革的本质。所以，兵团把基于这种文革本质的理解而来的夺权经全面付诸自己的全部历史活动中。一方面，兵团把揪斗走资派的斗争普及而又深入地引向整个北京乃至全国。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兵团在清华主楼广场前召开三十万各界群众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把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两百多名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揪来陪斗，力图把全部走资派置于死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兵团还不满足于斗争走资派，因为兵团把目光和矛头伸向打倒走资派之后的现今的当权派，它已远远不满足于称霸清华甚至北京，而要在全国文革运动中叱咤风云、左右形势。几乎在当时的每一文革热点地区和部门，兵团都曾插手或介入。仅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九月，兵团（包括两派的）先后向全国廿二个省、市、自治区的三十多个市、地区派出了近千人（一说六百人）的八十多个联络站、记者组，直接干预当地的文革运动。在北京，兵团更是积极关注党、政、军、学等部门的文革运动及权力斗争；参加历次的重大事件或活动，如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在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和八月二十二日冲击英国代办处；充当北京各高校红卫兵造反组织纵横向联系（“首都红代会”）执牛耳的角色；动辄以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把自己的主张和要求广泛推向社会。

兵团对打倒走资派之后刚刚建立起的当权派权威的动摇和冲击，就是试图把当权派现有的、即使是暂时的秩序纳入到自己非党的群众组织的控制之中。一九六七年春夏之际，兵团对当权派的干扰达到了高潮。四月，兵团开始参与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即夺军权的斗争，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兵团头目认为文革开始进入冲击军队、解决军权问题的新阶段，而军权问题就是军队里的山头势力。七月二十九日，在兵团作战部长带领下，四十多人抄了徐向前的家，抢走大量文件，并企图绑架徐向前。八月一日，批斗彭德怀、罗瑞卿，点名抨击徐向前、叶剑英、朱德等人。七月至九月，兵团派出许多军事动态小组，分赴各大军事单位或战略要地，收集有关部队番号、军队动向及军事首长状况等极密情报，绘制有关图表，力图使军队大乱。

在七月二十六日、三十日兵团主持召开“全国造反派头头形势讨论会”之后，兵团许多人热衷于支配一些地区的“文攻武卫”，部分头目更亲临有关地区，俨然以通天使者的身份指导外地造反组织，参与并指挥武斗，甚至冲击或占领军事单位，殴打军事人员，抢夺军用物资。使外地对立两派群众的积怨加剧，给已经混乱的生活及环境带来了更深的危机和灾难。兵团仿佛是要在冲击社会有序生活（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的无序运动中，寻求实现自己的价值及功能。

正如四一四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发表的《这是为什么？》一文中责问团派的：“为什么清华团总部在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地到处反军区、反革委会，而且是在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打倒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李再含、刘格平等第一炮几乎都是清华团派打响的，这是为什么？”原因之一：一旦当权派的权威阻碍以兵团为代表的造反派要权、抢权、夺权，或是这种权威碍于群众组织之间重新瓜分权力时，这种权威就应被打倒。在兵团兴盛之际，就有二十多名成员因严重触犯了这种权威而先后被捕入狱，可以说是兵团的“天性”。兵团的所作所为，把伯恩斯坦的“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机会主义哲学转换成“权威算不了什么，夺权就是一切”的造反哲学。

兵团身居高校也很重视教育问题，它深知文化、教育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对文革

发端的重要，所以多次在不同范围的师生中广泛讨论教育革命，竭力把高校教育楔入空想共产主义的模式中。兵团把每日上午八至十时定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间，把军训、学工、支农，把近于无政府状态的内外串联和召之即来的大字报、集会、游行、武斗等等当成了高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结果使当时六届在校的逾万名学生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所上的课程和所学的课堂知识少之又少。兵团的教育革命不仅是反知识、反传统的，也是反启蒙、反现代的。兵团在当时还设计出整个高校教育革命的乌托邦蓝图。例如，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兵团招生工作研究小组发表“关于改革大专院校招生工作的建议”，提出为“坚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应对各阶级按一定的比例招生：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应占65%以上，剥削阶级子女不超过5%。招生必须以贯彻群众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原则来进行。推荐应占招生人数的60%左右；为缩小城乡差别，农村推荐学生应占20—25%。对五类学生不予录取：家庭直系亲属中有被专政机关镇压者，走资派、牛鬼蛇神子女未与家庭划清界限者，文革中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屡教不改者或有反动言行者，不参加文革的逍遥派、书呆子。对于大学招生，“今后要彻底废除单纯分数考试制度”，“可实行开卷考试”。大学入学语文考试，考生可交一份文革中自己写的大字报底稿。兵团一系列的教育革命构想未能在实践中得到充分推行，只有一九七〇至一九七六年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算是为上述构想作出了漫画式的历史脚注。

### ◇ 三、兵团的分裂

自兵团成立之日起，内部就包含着分裂的因素，兵团总部成立第三天，就有三名委员因分歧而退出。形成井冈山兵团之一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早在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就在工作组斗蒯大富一事上持中立态度，认为蒯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新左派。随着兵团成立后各纵队势力的发展，以蒯为首的井冈山红卫兵（又称井冈山纵队）与另三大纵队（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东方红纵队）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主要表现在文革中的策略、形势评估、工作方法、权力分配、干部政策、对文革前清华的评价等方面，而最重要、最集中的就是干部政策。这些伴随着兵团成立、发展而来的分歧和矛盾最终致使兵团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和四一四总部。在清华园内，前者又被称为“团派”、“老团”，后者为“四派”、“老四”。因而，广义上，兵团包括团派与四派二者在内，即使四派的正式名称也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狭义上，兵团特指与四派结成对立统一关系的团派，反过来说亦然。不仅团派把自己有别于四派并以兵团正统自居，而且四派也自视为与团派平起平坐的兵团主流。两派的分歧和矛盾不断升级，导致双方走向冲突、武斗，最终导致它们各自的组织以至整个兵团消亡。两派的关系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1）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至一九六七年三月为分歧阶段。兵团刚确立自己在清华的主导地位，原井冈山红卫兵便加紧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一是对非井冈山红卫兵加以限制，以联合、团结为由，指责那些不满于兵团总部某些主张和策略的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甚至给昔日盟友扣上“托派”的帽子，下令解散敢提批评的战斗小组；二是对自己的嫡系倍加关照，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内外有别；三是以“我”为中心，下令解散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强化自己的集权；四是否定清华干部特殊论，认为清华干部必须自己站出“亮相”才能定性，却又独自给原清华校级干部定性并决定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针对这些，非井冈山红卫兵认为，造反派不等于革命派，夺权前与夺权后的红卫兵不能一概而论，井冈山红卫兵不能一统清华天下，包办一切，兵团总部迫于压力，多次进行整风活动，但从未达到内部思想上的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兵团面前：如何对待急于要求“解放”和工作的原清华中、基层干部？

（2）一九六七年四月至八月为分裂阶段。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及调查报告，批判清华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

篇文章在清华园引起很大反响。四月十四日，由五个纵队等组织召开“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成立了“四一四革命串联会”，藉《红旗》上的文章来批判那种否定一切干部的做法。该串联会随后与兵团总部进行了多次会场辩论和会场纠纷，前者要求为干部平反、平黑，后者要求干部自己起来造反。四月廿九日，原团委书记谭浩强、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代表一四七名原中、基层干部发表致革命干部公开信，认为干部们受了十个月的迫害，要求平反，要求工作，指责兵团的干部政策有缺点、错误。这封信是对四一四串联会的响应和支持。兵团总部反驳说，谭等不是中央文革肯定的干部，上述公开信是“复辟旧清华的宣言书”。五月九日，四一四已不参加兵团会议，而自己单独召集会议。四月三十日，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十一人）成立，兵团总部封它为在革委会成立之前的校临时领导机构。兵团总部对四一四既打又拉，由不承认四一四的合法性到被迫承认四一四，都是为了尽快建立革委会。五月十二日和廿一日，谢富治来清华促使两派达成四项联合协议，确定了扩大的廿二人的革筹小组名单。四一四群众指责自己代表的妥协，拒绝四项协议中关于必须执行革筹小组和兵团总部的决议条款。五月廿四日，兵团总部下发革委会成员讨论名单，要求一定要在五月三十日成立清华革委会。四一四针锋相对，拒绝参加自己只占少数席位的革筹小组及成立革委会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月廿九日凌晨，四一四广播台宣布成立四一四总部，发表成立宣言，正式与兵团总部决裂。五月三十日，由于转来周恩来不出席成立大会的通知及意见，最主要的是四一四的致命一击，使团派的革委会之梦永远消失了。六、七月，两派尽管试图联合，但由于团派坚持必须执行四项协议，而四派坚持自己的总部与团派总部对等的原则，使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

（3）一九六七年九月至十一月暂时联合阶段。迫于种种压力，两派于九月廿一日成立了兵团联合总部，并于十一月八日才迟迟正式宣布成立联合办公室、联合广播台、联合总部委员会，取消各自的相应机构，组成由团派十七人、四派十六人为委员的联合总部委员会。团派有些人对此深为不满，拉出了自己的组织“斗私批修联络站”，声称要“斗蒯大富的私，批四一四的修”，因为蒯急于要当联合之后的革委会头头。而四一四内部有人炮打陈伯达及中央文革，给团派排挤四派找到口实。两派的矛盾没有因为暂时的、表面的联合而缩小，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和扩大，双方发生了武斗及冲击对方会场、办公场所的事件。两派都已意识到更大规模的武斗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4）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为纠纷和武斗阶段。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起，兵团文革运动的重点已完全转向校内，团派与四派的对立愈益集中在如何评价文革前的清华及其干部的问题上。团派认为，文革前十七年的清华是黑线专政，几乎无可取之处。清华的干部，尤其是五〇年代培养并相继任职的，是资反路线的第二、第三套班子。这些干部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更加反动与危险。四派把团派的这套理论称之为“大翻个理论”，即从根本上否定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两派的理论交锋此时转向行动中的冲突。由于原中、基层干部大批倒向四派一边，加上团派风闻四派将推举原中层干部出任未来的革委会领导（而团派麾下的革委会中三结合干部没有什么代表性），于是他们以一首林彪语录被改为四一四战歌为藉口，于十二月初下令通缉四派总部六名委员，其中一人被抓。十二月四日，团派绑架、殴打和秘密关押了四派大力保护和推举的原清华核能研究单位“二百号”领导人吕应中，并于十二月六日、九日、廿日查抄了廿多名站在四派一边或同情四派的原清华中层干部的家，其中一些干部被打伤，一些被抓走。两派之间还发生了数十起小规模的血流武斗。两派互相冲击对方的要地，大造声势，要尽可能地压倒对方。十二月廿五日，团派为纪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五日行动一周年，便进城游行宣传，大叫要立新功，要为中共九大扫清道路，要造反派进入中共中央。次日，四派也进城游行宣传，直斥蒯大富想当中央委员，大拆团派的台。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下午



，两派为争夺学生十二号楼中的四派红尖兵广播室，发生了第一次有数百人参加的大规模武斗，武斗直至次日清晨才结束。一月三十日（春节），任职四派总部宣传部的罗征启在家中被绑架，三月廿七日罗因不堪折磨逃离关押点。团派匆忙于当晚抓走工物系教师、四派办公室干部贾春旺等人，对之加以关押、毒打。二月廿三日，四派在给中共中央有关方面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干部问题是清华建立革委会的关键，提议让原清华党委委员八至十人进入革委会，断定由“革命小将”担任革委会第一把手是不适宜的，要求中央委派军代表或他人担任。四月四日晚，一直监视罗征启家的团派保卫组抓走罗之弟罗征敷（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廿八岁），毒打后用擦车棉纱堵住其嘴，并将他塞入后车厢，活活闷死。四月十四日、十五日，团派关押了所谓“罗文李饶”案中的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刘承娴（皆为中层干部，与罗一起支持四派的干部政策）等人。此案造成三人死亡，廿余人受摧残。四月廿日，四派为了报复，抄了原电机系党总支副书记、代书记陶森的家，把陶绑架至四派占领的科学馆，因为陶代表三十一名干部批判了四派的干部政策。四月廿三日上午，团派和四派开始了震惊中外的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

（5）一九六八年四月廿三日至七月廿七日为“百日大武斗”阶段。关于这一阶段，笔者有专文另述，这里仅作简要描述。两派在百日大武斗中共有十一人死亡，三十余人残废，三百多人受伤。七月下旬，工人宣传队进校，又造成五名工人牺牲，七百三十一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千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之后，宣传队接管学校，团派、四派及至整个井冈山兵团自行解散、消亡。

#### ◇ 四、兵团的建制

兵团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建制是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初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兵团的正式领导机构是总部委员会，蒯大富、韩银山、鲍长康、马小庄、刘才堂、陈育延、陈继芳、任传仲、王良生任常委，后来是四派领导人之一的孙怒涛曾任过常委。除韩银山为原行政处干部，全部常委皆为在校学生。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之前，至少在团派与四派真正形成对峙格局之前，这一总部实际上临时负责清华大学的日常领导工作。总部下辖总部办公室、作战部（又称一部）、政治部、后勤部等常设部门，每一部门都由其核心组负责领导工作。总部办公室设有秘书组、电话组、常务组、资料组。作战部设有对内作战部和对外作战部，前者辖部队办公室、发放组、保卫组、三办（专案）、斗蒋兵团、大行动组、大批判组等；后者辖办公室、社会调查组（又称动态组，分为一动“兵团动态”、二动“校内及四一四动态”、三动“首长讲话及北京动态”、四动“中学动态”、五动“运事动态”、六动“国际动态”六个小组）、全国联络站（办公室、资料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等）。政治部设有办公室、宣传部、学生工作部、教工工作部、二办（干部办公室）、组织部等。后勤部设有办公室、科技组、财务组、生活组。根据情况需要，兵团还设置一些应急机构，如文攻武卫指挥部、“罗文李饶”专案组、吕应中专案组、斗批改联络站、遵义学习班（学生学习班分部）、平型关学习班（干部学习班分部）、战地宣传队等。

兵团的组织建制是把各系、处等单位按军事编制划为○一至十五部队（一度扩为二○部队），各部队由若干战斗组构成。这些以革命术语或红色词句（如“契卡”、“刺刀见红”、“指点江山”等等）命名的战斗组由人数不等、关系相对松散而志向相同的成员组成。兵团的群众性组织主要有以学生为主的廿八团、以职工为主的“清华大学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

兵团的宣传机构有《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广播台、前哨广播台、井冈山通讯社、井冈山杂志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主要由兵团宣传部负责。兵团在不同时间、不同范围出版发行的刊物有“井冈山报”、“井冈山杂志”、“井冈山通讯”、“文化大革命简报”、“学习资料”、“理论批判”、“整风简讯”、“大



字报选”、“内部资料”以及各动态组的有关动态等。这些刊物是由兵团总部的不同部门主办的，其中有的刊物不仅信息量大、选题广、而且在当时的北京及外地颇有影响。如，刻板油印的“井冈山通讯”在其发行的一年半左右，共出版了近千期，而且往往是一日数期，内容包括内到外、中央兼地方、工农商学兵几乎各界的文革情况和动态。这些刊物表明，兵团重视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特别重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有关负责人的讲话、指示，力图通过自己的刊物所造的舆论声势来加强自己的形象和影响；进而还表明，兵团在建有较健全的政治、宣传等机构的同时，也拥有较发达的、辐射全国的情报机构，这在当时的群众组织中是极为少见的。无疑，这些刊物对于了解和研究清华以及全国文革初期的历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四一四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建制是在“四一四革命串联会”核心组之基础上，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四一四由其总部领导，总部委员有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刘万璋、汲鹏、宿长忠、张雪梅、蒋南峰、李秀芙、傅正泰、谭浩强、任彦申等五十四人。四一四总部下辖总部办公室、作战部、干部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保卫部、干部参谋组、斗蒋作战部、政治部、行政管理总勤务站、斗批改办公室以及后来的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作战部设有第一作战部（负责北京及校内）、第二作战部（负责大批判）、第三作战部（负责全国，辖办公室、资料组、军事组、东北组、华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西南组）宣传部设有动态组、简报组、广播台、报纸编辑部、发放组。四一四总部尽管在规模上小于团派总部，但是它十分重视基层建设，在基层单位共有十二个部队（亦称01—12支队）和较完整的分部机构。四一四的群众组织主要是以学生为主的东方红战团和以教工为主的二七战团。四一四最盛行时期自称有七千人。

四一四在不同时间、不同范围出版发行的刊物有《井冈山报》、《四一四战报》、《情况简报》、《井冈山参考资料》、《大字报选》、《清华四一四通讯》、《教革》、《联合风暴》、《满天红》、《重要文件》等。这些刊物在创办时间上晚于团派刊物，在选题范围、信息含量等方面也难与团派刊物平分秋色。在报导有关校外文革情况时，两派刊物常常雷同。只是在涉及到清华文革形势和两派歧见时，两派刊物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两派愈是到了后期，愈是利用各自刊物尽其所能地抨击甚至诅咒对方。实际上，两派刊物是“互补的”，即在一方的偏颇处可发现另一方的特色。若要“解读”整体意义上的井冈山兵团史和清华文革初期史，这种互补性是不能忽视的。

## ◇ 五、几点评价

（1）兵团的历史证明，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最难以驾驭的运动，群众组织（包括造反组织和保守组织）远不是党的群众组织。它们本身既是自发的，更是自觉的；既是疯狂的，更是理智的；既“发祥”于党的谋略，更超过党的约束。党的斗争由非党的群众组织充当其主体和动力，并变为群众运动，这是文革初期历史的、必然的“二律背反”，也是整个文革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不可化解的矛盾症结。

（2）兵团的消亡标志着文革初期造反派组织和个人在整体上的衰落，变本加厉的夺权，更主要的是旷日持久的内讧和武斗，使得造反派组织和个人不可能适时地把其兴起的社会动荡转变为社会稳定。他们把旧体制打倒了，但却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新体制。以兵团为大纛的整个造反派的使命和作用一九六八年秋濒于结束，文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兵团的历史角色在于演出了一幕不是“革命吞噬革命者”，而是“造反吞噬造反者”的闹剧！

（3）兵团的经历所呈现于后人的是难以计数的大会、游行、铺天盖地的大字

报、大标语、激情奔泻、内容枯燥的战斗文体，呼天喊地的声讨和蛊惑，如火如荼、近无人性的武斗，风卷如席的绑架、抄家，对敌手无所不用其极的举措，而自身既有文过饰非、言行不一的劣根，也有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恶习，更有追逐功名、嗜权如命的丑态…。略过这些，笔者要问：兵团的成员作为当时中国最敏感、聪慧、自视为最具有社会主义感和历史责任心的青年学生，他们最缺乏的是什么？恰恰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

（4）兵团与其说是一个红卫兵组织，莫如说是一种红卫兵运动。红卫兵组织作为文革中的青少年组织虽然延续了十年，但红卫兵运动实际上只有两年左右的历史。这种红卫兵运动尽管按照自上而下的政治指令来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扫荡，试图为青年寻求一条变革社会而实现大写的自我途径，但它从未摆脱专制及专制主义的羁绊，本身恰恰就是这种专制及专制主义的社会文化的二元怪物，即：在思想上，它是一种反独断主义的独断主义；而在政治上，它是一种反极权主义的极权主义。它似乎成了六〇年代末青年一代反抗社会、拒绝权威的破灭了的神话或偶像。红卫兵运动既把大批判、大武斗、大拒绝之火引向社会和人民中间，又把分裂和灭亡之火引向自身，它在企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历程中走进了自我异化的归宿。兵团在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无穷的思索。

□ 转载自 《新闻自由导报》204、205期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本期责任编辑：[华新民（美国）<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赵桦（美国）<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徐名扬（澳大利亚）<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熊波（美国）<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萧同（美国）<cnd-cord@cnd.org>](#)  
《CND》总编：[温冰（加拿大）<cnd-manager@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mailto: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mailto: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cnd.org)[132.249.229.100]：pub/hxwz  
（加拿大读者可用：[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hxwz）

考访服务站（Gopher）：[cnd.org](http://cnd.org)（中文或英文目录）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本期编辑用软件: XLBR 2.0 ©严永欣 NJSTAR ©倪鸿波  
GBLIST ©陈公权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 ©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日常编务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XT